

宋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历代诗选

张
选注





宋诗选

兴文学读本丛书·历代诗选

张
鸣
选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版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诗选/张鸣选注.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5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ISBN 7-02-004520-0

I. 宋… II. 张… III. 古典诗歌 - 作品集 - 中国 - 宋代 IV. I222.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8997 号

责任编辑: 宋 红

责任校对: 宋 红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宋 诗 选

Song Shi Xuàn

张 鸣 选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泰格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00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25 插页 2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ISBN 7-02-004520-0/I·3445

定价 28.00 元

前 言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宋诗取得的高度成就,就是这一文化空前繁荣的表征之一。

宋人对自己创造的文化,有高度的自信。朱熹有言:“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楚辞后语》卷六苏轼《服胡麻赋》题解,见朱熹《楚辞集解》)近现代以来,朱熹对本朝文明成就的这一论断在学界得到了高度的认同。

如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宋代之金石学》,见《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

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

邓广铭也说:“宋代的文化,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见《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

宋代文化的高度发达,以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同步和谐地发展为重要特征。宋诗的辉煌成就以及独特风貌,就是这一文化孕育的结果。

在繁荣兴盛的文化氛围中,宋代文学,丰富全面,各种文类共存共荣,交相辉映,互相影响,共同构成了繁荣的文学景观。古文、赋、四六、笔记等由士大夫阶层掌握的文体,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发展,产生了丰硕的成果;话本、诸宫调、鼓子词、杂剧、唱赚等由新生的各种民间通俗文艺派生的通俗文学,也正式进入文学史的领域,成为此后文学主流的源头;而兴起于唐代的音乐文学——曲子词,也在宋代达到了发展的高峰。宋诗就是在这样全面繁荣的文学景观之中生存发展,变革自立,在其他文体的辉映下,成为宋代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

诗歌是宋代士大夫使用频率最高的文体。新编《全宋诗》收录诗人不下九千人,诗作 3785 卷。无论作者人数还是作品数量,都大大超过现存唐诗,而且这只是不完全的数字。庞大的数量可以证明诗歌这种文体在宋代士大夫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和普及程度。

宋人作诗,在许多方面继承了古人的优良传统,言志抒情,表现士大夫经世济民的政治抱负,表现诗人的各种生活体验,抒写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和各种闲情雅趣。古代诗歌创作传统中的许多正面价值,比如表现创造性的审美体验,追求高远的境界,提倡美刺比兴,坚持独立人格,保持对社会的批判精神等等,都在宋代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宋诗作为新型学术文化环境的产物,本身又具有不同于前代诗歌的许多特色。

宋代诗人,就其身份性质和人格而言,与前代诗人相比,有

许多明显而又微妙的变化,许多人都集政治家、学者(思想家)、文学艺术家于一身,比如欧阳修、刘敞、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杨万里、陆游、范成大、尤袤、朱熹等。都是从政、治学、做诗三不误的著名诗人。他们的诗歌,无不体现着三位一体的人格所带来的时代色彩和独特的个性。宋诗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和现实的关怀,不仅范围广,而且开掘深;对自然、社会的观照和书写表现,也创造了许多新型的审美典范。这都与诗人主体素质的特点有关。苏辙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人生逐日,胸次须出一好议论,若饱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别于禽兽?”其实这是要求对社会、对历史、对时事、对自然、对人生各种问题,要有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思想。“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诗)宋人的文化创造,就与这种“出一好议论”的追求直接相关。有了好的议论,在诗歌当中加以表现,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曾被严羽所批评的“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其实是宋代文化赋予宋诗的重要素质,既体现了宋人理性的思考,又表现了士大夫阶层强烈的现实关怀之心。它是宋代诗人三位一体的人格塑造和认同的重要表征,不能仅仅看作作诗方式上的特点,更不宜简单地否定。

宋人作诗,又强调“以意为主”(刘敞《中山诗话》)。重视“意”的表达,同样是强调表现诗人智性思考的内容。与前代诗歌相比,在当时的学术文化环境中,诗人以新型的文化趣味和审美眼光观照生活和自然,诗歌的题材大大拓展,表现内容更为丰富,思想趣向和情感体验也较为复杂。前人没有写过的题材可以入诗,前人写过的题目则要写出新意,这就形成了前人所说的宋诗“取材广,命意新”的特点。宋诗“意”的范围十分丰富复杂,读书治学、博物考证、日常琐事、随感杂记、谐谑调笑等等过去较

少入诗的内容,都大量地写入诗中,诗歌的写作显得更为随意,表现的内容也更为平凡。对日常生活的琐事细事、自然界的平凡景物的审美观照,成为宋诗表现的重要内容。不少作品诗境浅近,诗意平凡,宋诗因此常受后人的批评。其实,品味日常生活的诗意,发掘平凡事物的审美意趣,正是宋诗的重要贡献。诗歌内容的丰富复杂,审美体验的日常化、平凡化,都是宋人诗歌审美意识深化、审美能力提高的表现。宋代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没有窒息宋人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创造力,反而成为他们对精神文化的超越性追求的雄厚基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保持了和谐共荣的发展态势,历史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无疑,保持对物质生活的诗意观照和品味,是其中关键。

就“意”的书写表现而言,宋人也有许多创造性的贡献。既然强调“意”,而“意”的范围又十分广范,在表现上就不免借鉴散文的述说方式,使诗歌的“意”的表现更为丰富,更为深刻,也更为直截了当。受散文语言的影响,许多诗人都大量使用散文化的句式和虚词,追求诗歌语言表达的平易流畅。这种“以文为诗”的方式,给诗歌文体带来许多新的因素,散文化的语言和句式,不仅有利于“意”的直陈,而且给诗歌带来更多的韵律节奏变化。同时,韵律节奏变化带来的陌生化效果,又在许多方面改变了诗歌文体的审美特性,甚至使得诗歌文体性质发生了许多微妙的位移。宋诗的新变,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这种从诗体“出位”而向散文的位移。在欧阳修、苏轼等代表诗人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许多“以文为诗”的范例。这也成为宋诗的一个重要特点。一种文体借鉴其他文体的因素融入自身,从而形成新的特性,取得新的发展,不仅是文学史上常见的现象,而且可以看作是文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在这一点上,宋诗提供了成功的典范。欧阳修等人变革诗风,其实是以自己成功的创作促进了文学发

展的进程。对宋诗持否定态度的人,往往也否定“以文为诗”的意义,但这其实等于否定了诗歌文体发展的必然趋势。

宋代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宋人兼容并包的文化胸怀分不开。儒、释、道三家的合流、圆融,成为宋代思想的突出特征。在儒家的范围就呈现出各家并起,派别林立的局面。宋人把治学看作人格完善的重要途径,“闻道”成为人生的最高追求目标;“民胞物与”的精神,更成为士大夫人格的重要支撑。兼容儒、释、道三家的思想,造就了新的人格范型。许多诗人既关怀现实,以经世济民为己任,对社会民生保持强烈的责任心,同时,对人生又有较为超越、达观的态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通达的人生态度,使许多诗人解脱了悲哀穷愁的困扰。凡此种种,都对诗歌风格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宋代学术文化的兼容并包和创新自立意识,同样影响到诗歌。北宋庆历前后学术界的疑经、疑古之风,为建立新型的学术文化奠定了基础。而庆历前后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石延年等人倡导诗风变革,新型的时代风格初步形成,这一过程,与当时新型思想学术的建立保持了基本同步的趋势。诗风变革的主要倡导者欧阳修,同时也是庆历时期学术疑古思潮的主要代表之一。宋学的疑古、疑经,目的在于创新自立,宋诗时代风格的树立,也得力于这种创新自立的意识。宋学怀疑精神培养的自由思想的追求,在更深的层面上影响了宋代诗人的思想方法,宋诗的纵横议论、滔滔雄辩和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就与这种自由思想的追求有密切的关系。宋学长于思辨,析理精深,诗人生活在这种学术风气之中,其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同样会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正是宋诗的深湛理趣得以产生的土壤。当然,学术和诗歌,各有各的领域,各有各的规则,如果混淆了二者的界限,把诗歌当作直接言理的工具,就不免产生不伦不类的结果,宋代诗歌中就有不少作品混淆了诗与思想学术的

规则界限,这些作品不在我们选录的范围,但其存在,同样是宋学影响宋诗的明证,因此还是值得一提。

宋代印刷出版技术比前代有了飞跃的进步。印刷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空前高涨的文献整理兴趣,前代留存的写本、抄本文献,经过宋人整理校勘,印刷出版,文献的载体发生了质的变化,书卷的量更远远超过前代,大量文献的广泛流传,为宋人的读书提供了方便的物质基础。宋人读书,不仅为了科举应试,也不仅为了治学,许多人更是当作人格提升的自觉追求。“懒思身外无穷事,愿读人间未见书。”(蓝奎《断句》)“主人静坐心无物,读尽人间未见书。”(赵期《自述》)读书成为生活中不可须臾离开之事,甚至成为时尚,在历史上这样的时代并不多。宋代诗人,生活在这样的条件和风气中,其人格得益于读书的培养,其诗歌同样会体现读书的熏陶,尤其是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朱熹等大诗人,无不以读书多而著称。前代诗人,读书就没有宋人这样优越的条件,更没有宋人这样的兴趣和追求,即使号称“读书破万卷”的杜甫,在宋代这些学者型大诗人面前也不免处于下风。宋人的读书,给他们的诗歌带来了浓厚的书卷气。这首先表现在诗歌的内容上,许多作品表现读书人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读书心得,书画鉴赏,品茶赏花,考证名物,辩论学术,无不入诗。其次体现在诗歌的表现手段上,比如诗中比喻,许多是采用来自书本的意象,如苏轼的“欲把西湖比西子”,“西子”只存在于史书记载的历史故事中,并不是眼前直接可感的事物。又如大量用典,几乎成为宋诗的标志性特点。像苏轼和黄庭坚这样的大诗人,其诗中典故之丰博,用典方法之层出不穷,都使人叹为观止,也使许多读者望而却步。宋诗常因典故多而受到非议,批评的意见总有一些道理。不过应该注意,宋诗的用典,在宋人是因读书多而习以为常的,他们

用典故作为表现手段,从另一个角度看,具有用历史文献的人文价值解读世界和书写世界的意义,诗中反复出现的典故,其实又使沉睡于载籍中的文化资源得以在现实语境中复活并闪现光彩,使之以诗意的形式进入新的传播过程,从而又起到了文化传承的重大作用,其意义又不仅局限于一两首诗歌的表现与解读而已。认识到这一层,对于宋诗的用典多,就不宜简单地加以否定了。宋诗的书卷气,还表现在诗歌的语言上。宋人较多地从古代经史子集佛经道藏等书面历史文献中汲取语言资源,诗歌的语言更为书面化。宋诗的传播,主要靠书面的阅读,诗歌语言的书面化,实是大势所趋。

关于宋诗和唐诗的区别,前人论说已多,这里不再重复。不过有一点似乎还很少引起注意,那就是在诗歌与音乐歌舞的关系上——

大体看,唐诗还没有完全脱离音乐。唐代,许多诗歌都曾经入乐歌唱,因此唐诗许多作品其实是“声诗”、“歌诗”,并不完全是纯粹的书面文学。依靠歌唱流传,是唐诗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而宋代则是不同的情形,由于曲子词的发展,诗歌的音乐功能已经被曲子词替代,宋诗已经完全脱离了音乐,基本上是徒诗,不再入乐歌唱,宋诗的传播和接受主要靠书面阅读。也就是说,宋代诗歌已经成了完完全全的书面案头文学,这一文体性质,导致宋诗形成了自己的文学审美风格,也为宋诗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影响划定了范围,宋诗的发展道路在许多方面同样受到这一特性的制约。宋诗和唐诗的这一差别,虽然巨大,却又是隐性的,往往被研究者忽视,因此值得加以强调。

如果从更为广泛的文化视域中考察,宋代文人作诗,既是为了抒写情性,又不仅仅为了抒写情性。诗歌的社会文化功能在宋代得到了许多拓展。诗歌是当时文人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

即使是最反对作诗的理学家如程颐,也免不了做几首诗,这不能只用技痒来解释。作诗实际上是具有文化修养的证明,北宋吕蒙正未中举时,生活贫寒,被胡旦轻视,知情者于是对胡说:“吕君工于诗,宜少加礼。”(见欧阳修《六一诗话》)对诗才的重视,其实是对文化修养和文人身份的看重。诗歌在宋人手中,还是文人圈的社交工具,宋人诗集中,几乎家家都收有大量交游唱和的作品。宋人还把交游唱和的诗歌编成专门的诗集出版,如著名的《西昆酬唱集》、《坡门酬唱集》、《礼部唱和诗》等等。西昆酬唱还引出了一个诗派的形成,导致了一种诗风的广泛流行;坡门酬唱聚集了苏轼及其门下的文学英才,他们通过诗歌唱和交流感情、切磋诗艺,在北宋元祐前后诗坛上同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都证明宋人唱和的活动及其唱和的诗歌,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不宜简单看作应酬而予以否定。宋人又把诗歌的唱和称为“诗战”(见王禹偁《仲咸以余编成〈商於唱和集〉以二十韵诗相赠依韵和之》),从这一称呼可以看出他们的唱和带有较量、切磋诗艺的积极目的。而且,诗歌作为诗人之间感情交流的工具,其社会作用更不宜低估。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的诗教,孔安国解“群”为“群居相切磋”,这可以有二个层面,一是诗歌阅读中的“群”,一是诗歌创作中的“群”。如果就后一层面而言,宋人的大量唱和诗,就最为集中地体现了“兴、观、群、怨”诗教中的“诗可以群”。

诗歌在宋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读诗、写诗,所体现的是一种人格气度和人生趣味。优秀诗人,受到广泛赞誉,优秀诗作,更是传诵众口。苏轼在世时,其诗歌“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读诗、作诗,对一个士大夫而言,意义之重大可想而知。这种崇尚诗歌的心态,对普通

世俗社会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宋元时期民间的“说话”艺术，说书艺人讲述故事，每当讲到重要之处，或者说书人的品评意见需要寻找支持时，总会来一句：“有诗为证。”虽然所引咏的诗歌可能浅陋鄙俗，甚至可能文不对题，但在“有诗为证”的语境中，说书人的讲述和意见需要诗歌来证明，而诗歌则似乎天然具有不需证明、不容怀疑的绝对正确性。这说明在宋代“说话”艺人和普通民众的心目中，诗歌是具有权威地位的文体。宋代“说话”的“有诗为证”，通过话本小说文本流传下来，成了古代白话小说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有诗为证”，要在全社会崇尚诗歌的语境中才有可能成立，这充分证明了诗歌在宋代社会文化中的重要位置。

二

宋代诗人在继承前代诗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自立。新型的文化氛围，为宋诗风格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文化资源。宋儒治学，多有高远的追求目标，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说，就是最有魄力的代表。这种人格自信，这种自我期许，形成了一种时代风尚。由学术文化方面培养起来的自信人格，并不仅仅表现在学术界。在诗歌的领域，时代的自信人格同样也为诗风的创新创造了良好的主观条件。

不过，异于“唐音”的“宋调”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较长时期的探索、创变和调适，经过高潮兴盛，又逐步走向衰落，其三百多年的发展演进历程，大致上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北宋开国（公元960年）到宋真宗乾兴元年

(1022),亦即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六十多年。这一时期文学,从晚唐五代延伸下来的浮弱文风还是文坛的主流,诗歌最初也延续了晚唐五代以来的风气,学习白居易的诗风成为诗坛的主导倾向,从五代入宋的朝中大臣,后起的新朝文士,甚至水边林下的僧人隐士,无不沉浸于这种风气之中。此外还有受郑谷影响的清浅诗风以及学习贾岛、姚合的所谓“晚唐体”,但都未成气候。白体诗风在宋初流行了近四十年,直到这一派的代表王禹偁去世(1001年)才开始衰落。此后,杨亿开始提倡学习李商隐诗歌,并于馆阁主持修书时与同僚模仿唱和。杨亿曾自述道:“至道(995—997)中,偶得玉溪生诗百餘篇,意甚爱之,而未得其深趣。咸平、景德间(998—1007),因演纶之暇,遍寻前代名公诗集,观富于才调,兼极雅丽,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曲尽万态之变,精索难言之要,使学者少窥其一斑,略得其余光,若涤肠而换骨矣。由是孜孜求访,凡得五七言长短韵歌行杂言共五百八十二首。唐末,浙右多得其本,故钱邓帅若水未尝留意捃拾,才得四百餘首。钱君举《贾谊》两句云:‘可怜半夜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钱云:‘其措意如此,后人何以企及?’余闻其所云,遂爱其诗弥笃,乃专缉缀。鹿门先生唐彦谦慕玉溪,得其清峭感怆,盖圣人之一体也。……世俗见予爱慕二君诗什,夸传于书林文苑,浅拙之徒,相非者甚众。噫!大声不入于里耳,岂足论哉!”(见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四引。关于这段材料的考辨、杨亿提倡西昆体的动机、以及宋初白体诗风和西昆体诗风的更替等,参看拙文《从“白体”到“西昆体”》,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三辑,1995年。)

杨亿随后将唱和之诗编成《西昆酬唱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学习李商隐的诗风很快风靡一时,取代了白体诗风的地位。如北宋《蔡宽夫诗话》所说:“国初沿袭五代之餘,士大夫皆宗白

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西昆体的出现和流行，是这一阶段最为重要的现象。杨亿提倡学习李商隐，似乎与文章领域的复古主义遥相呼应，变革诗风的动机十分清楚，而西昆体诗歌体现的才华和学力，也使诗坛耳目一新，“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欧阳修《六一诗话》）。因此，宋人一般都把西昆体看作是宋初诗歌的一次变革，杨亿本人就把西昆唱和看作是“首变诗格”（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七引杨亿《杨文公谈苑》）。田况《儒林公议》卷上也说：“杨亿在两禁变文章之体，刘筠、钱惟演辈皆从而效之，时号‘杨、刘’。三公以新诗更相属和，极一时之丽。……其他赋、颂、章奏虽颇伤于雕摘，然五代以来芜鄙之气，由兹尽矣。”对杨亿最为推崇的当数后来领导诗风变革的欧阳修，《六一诗话》说：“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解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如子仪《新蝉》云：‘风来玉宇乌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又如大年‘峭帆横渡官桥柳，叠鼓惊飞海岸鸥’，其不用故事，又岂不佳乎？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馀，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这几乎是毫无保留的肯定了。据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记载：欧阳修曾以书答蔡襄说：“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同样可见赞赏推崇之意。不过，这一时期的诗歌，总的倾向仍然停留在学习和模仿唐诗的阶段，即使被称为“首变诗格”的西昆诗风也是如此。

第二阶段，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到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将近八十年。这是宋代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文

章的方面,从前一阶段开始产生的文学复古思潮逐步蔚为风气,新古文运动经过曲折的历程,在欧阳修的领导之下,于宋仁宗朝取得了胜利,确立了古文的主导地位,并树立了新时代的健康文风。其后以苏轼为代表的一批文人的古文写作,更是代表了宋文的最高成就。宋词在这一时期同样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先有柳永顺应音乐的新变,为民间新声编撰歌词,突破了《花间》、南唐词的局促天地,构成了宋词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变革;后来更有苏轼的“以诗为词”,提高了词体的文学地位,为词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泛的空间。八十来年时间,词坛名家名作辈出,形成了宋词发展的繁荣局面。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兴盛,这一时期各种歌舞杂剧、说话艺术、诸宫调、鼓子词等民间通俗文艺也在勾栏瓦舍中蓬勃发展,不仅为民众所喜爱,甚至吸引了文人为其编撰文学脚本(如石延年、秦观、毛滂、晁补之编撰“转踏”歌舞词,欧阳修、赵令畤编撰鼓子词等)。与此相应,宋诗也迎来了发展的高峰,与当时古文、歌词、通俗文艺的繁荣交相辉映,共同构成文学的欣欣向荣的局面。

这一阶段的诗歌,又可以分为以宋仁宗庆历时期为中心和以宋哲宗元祐时期为中心的前后两段。

庆历诗坛是宋诗时代风格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学术文化的发展极为兴盛,许多学者开始怀疑前代学者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学术上的疑古、疑经成为风潮。疑古是为了创新,新型的学术在这时开始奠定了基础。宋诗风格的新变,就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中展开的。这一过程大约始于宋仁宗天圣年间,虽然这时西昆体诗人钱惟演还健在,西昆体后期诗人晏殊正处于创作的高峰,诗坛尚流行西昆体诗风,但诗风的变革也正在逐渐显现。这时主要有两个诗人群的活动起了重要作用。

一群是活动于汴京的石延年、苏舜钦、苏舜元兄弟等,他们

在穆修的影响下,于天圣年间以兴复古道相标榜,写作古歌诗杂文。他们以豪迈雄健的诗风使诗坛受到震动,特别是他们创造了一种刚劲明快、雄畅硬健的语言风格,冲击了雕章琢句的西昆诗风,给诗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另一群则是活动于洛阳的欧阳修、梅尧臣、谢绛等人。欧阳修于天圣八年(1030)中举之后,在西京留守钱惟演手下任职,与当时在洛阳的尹、谢、梅等人交游唱和,共同致力于变革诗风的尝试。他们的文学活动得到了钱惟演的奖誉和扶植。这一诗人群中梅尧臣曾被后人称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他的许多诗论在当时具有革新诗风的纲领性意义,比如他针对“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和唐末五代以来“区区物象磨穷年”(《答裴送序意》)的风气而明确提出继承风雅之道,“不作风月诗”(《寄滁州欧阳永叔》)。主张“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这些看法正是主张革新诗风的诗人的共同准则。他的一些精彩的诗论还成为当时及后来诗人经常引述的话头。比如他标榜“平淡”作为诗歌的最高艺术境界,以“浅俗”为诗之大病;主张“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六一诗话》引);还要求“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后山诗话》引)等等,都成了宋代许多诗人在创作中共同遵守的原则。

引领诗风变革的更为重要的人物当数欧阳修。欧阳修是庆历学术风潮中开风气的人物之一。又是政治家、学者、文学家三位一体的人格的典型代表。宋人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可以说开风气者就是欧阳修。他追求格调高而命意深,以贍博的学问和高超的识见去纠正晚唐五代以来的浅薄和卑俗。他教人作诗法门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苕溪

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九引)这就是一个学者型诗人的见解,在宋代诗人中,这个见解非常有代表性。清人方东树曾称赞欧阳修诗“深入无浅意”(《昭昧詹言》卷十二)。的确,他虽时有粗疏无馀味的败笔,却少有卑弱凡俗的篇章。他曾批判韩愈“叹老嗟卑”,无异庸人(见《读李翱文》、《与尹师鲁书》),他自己的诗便很少无病呻吟。自他之后,以见识和学问相标榜成为一代风气,卑俗的诗格成为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大忌,宋诗的书卷气便越来越浓郁。欧阳修对宋代诗风的影响还突出地体现在诗歌语言上。欧阳修之前的宋初诗坛,语言方面基本是在模仿唐诗,而且学白体者流于浅俗,学晚唐者流于细碎,学西昆者失之雕琢,都未能在语言上走出一条可通行的大道。因此,变革诗风就必须在语言上有所突破。为表现充实的思想内容,也促使欧阳修等人寻求能够充分表情达意、议论说理的语言方式。欧阳修曾针对《周易·系辞》“言不尽意”的观点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古圣贤之意,万古得以推求之者,岂非言之传欤? 圣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书乎? 然则书不尽言之烦,而尽其要;言不尽意之委曲,而尽其理。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非深明之论也。”(《试笔·系辞说》)他既看到了书不尽言之烦、言不尽意之委曲的一面,更重要的是指出了书能尽言之要、言能尽意之理。把语言表达的功能和局限都剖析得清清楚楚。这证明他在诗歌语言的追求上具有明确的理论指导,也可以看出他很注重语言文字沟通作者与读者的作用。他自己作诗特别重视诗歌与读者的沟通,在语言上自觉地追求文从字顺,形成畅达的特色。清人吴乔说:“宋人作诗,欲人人知其意,故多直达。”(《围炉诗话》)可以说,欧诗就是突出的典型。宋朝称赞欧诗的人说它“只欲平易”(《雪浪斋日记》),“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言多平易疏畅”(《石林诗话》卷上),批评的人说它“少馀味”(《临汉隐居诗